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它让你旋转，让你颠倒，把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放在它的头上。

由皮科伊耶尔

最初，我们旅行是为了迷失自我；接下来，我们旅行，去找到自己。我们旅行来打开我们的心和眼睛，了解这个世界比我们的报纸将容纳的更多。我们的旅行是为了利用我们的无知和知识，把我们所能带到的东西带到世界上那些财富分散的地方。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旅行是为了再次成为年轻的傻瓜——放慢时间，被接纳，再次坠入爱河。乔治·桑塔亚娜在他的经典文章《旅行哲学》中，也许在人们频繁飞行之前得到了最好的描述。这位哈佛哲学家写道，我们“有时需要逃到公开的孤独，漫无目的，进入冒一些纯粹危险的道德假期，以提高生活的边缘，尝尝苦难，无论如何都被迫拼命工作一会儿。”

我喜欢工作上的压力，因为在路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祝福与之前的困难成比例；我喜欢假期的压力，因为我们很容易养成我们的道德习惯，就像晚上躺在床上一样。我们很少有人会忘记“旅行”和“旅行”之间的联系，我知道我旅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困难——我自己的，我想要感受的，我需要看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旅行会引导我们更好地平衡智慧和同情心——清楚地看到世界，同时又真正地感受到世界。因为没有感觉的视觉显然是冷漠的；而看不见的感觉可能是盲目的。

然而，对我来说，旅行的第一个巨大乐趣就是把我所有的信仰和确定性留在家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认为我所知道的一切。在这方面，即使是肯德基出口（北京）或粗糙的复兴的“野生兰花”（香榭丽舍大街）可以新奇和启示：在中国，毕竟，人们将支付一个星期的工资与上校桑德斯吃，在巴黎，米奇洛克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演员杰里刘易斯。

如果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一家蒙古餐馆对我们来说具有异国情调。，这只能说，麦当劳在乌兰巴托看起来同样具有异国情调——或者至少同样超出预期。虽然现在时尚区分“旅游”和“旅行者”，也许真正的区别在于那些离开他们的假设，和那些不：那些不，游客只是有人抱怨，“没有什么是在家里，”而旅行者是抱怨，“这里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在开罗——或库斯科或加德满都。”这一切都很不一样。

但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旅行的主权自由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让你旋转，把你颠倒，把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站在它的头上。如果一个文凭可以是一个著名的护照（通过硬现实主义的旅行），一个护照可以是一个文凭（为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速成课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在路上学到的第一课是，我们认为是普遍的东西是多么的临时和狭隘。当你去朝鲜，例如，你真的觉得你降落在一个不同的星球，朝鲜无疑觉得他们被一个外陆，（或者他们只是假设你，，每天早上收到订单从中央委员会穿什么衣服和使用什么路线走路上班，和你，他们，卧室有扬声器每天早上黎明广播宣传，和他们一样，你修理收音机，以便只接收一个频道）。

因此，我们旅行的部分原因仅仅是为了通过看到我们所有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紧急事件，以及我们在家里很少要面对的生死困境，来动摇我们的自满情绪。我们旅行来填补明天留下的空白的标题：当你开车在太子港的街道，例如，几乎没有铺装和妇女缓解自己旁边堆积如山的垃圾，你的概念的互联网和“一个世界秩序”越来越有效的修订。旅行是我们拯救一些地方的人性，从抽象和意识形态中拯救他们的最好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从抽象，来看看我们可以带多少我们访问的地方，和多少我们可以成为一种信鸽——一个反联邦快递，如果你喜欢，在来回运输每个文化需要什么。我发现我总是把迈克尔·乔丹的海报带到京都，把编织的宜家篮子带回加利福尼亚；我总是带着泰诺和肥皂去古巴，回来时带着堆满萨尔萨舞带、希望和给失散已久的兄弟的信。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价值观、信仰和新闻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变成了行走的视频屏幕和活的报纸，唯一可以让人们走出他们祖国的审查限制的渠道。在封闭的或贫困的地方，如异教徒、拉萨或哈瓦那，我们是我们遇到的人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与外面世界的唯一接触，通常，最接近的，他们会来到迈克尔·杰克逊或比尔·克林顿。因此，旅行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学习如何进出口温柔的梦想。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听到（经常）普鲁斯特的老话，关于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看到新的地方，而是用新的眼睛看。然而，旅行的一个微妙的美在于，它能让你给你遇到的人带来新的眼睛。因此，即使假期帮助你更欣赏自己的家——尤其是通过遥远的崇拜者的眼睛——它们帮助你把新的欣赏的——遥远的——眼睛看到你所访问的地方。你可以教他们庆祝的，就像你庆祝他们教的一样。我认为，这就是旅游业明显破坏文化的方式，也可以复兴文化，它在巴厘岛创造了新的“传统”舞蹈，并使印度工匠对他们的作品给予新的关注。如果我们能把第一件事古巴人是一个真正的和平衡的当代美国是什么样子，第二，——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带给他们是一个新鲜的和重新特别的国家的温暖和美丽，对于那些可以与全球其他地方。

因此，旅行同时以两种方式旋转我们：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通常可能忽略的景象、价值观和问题；但它也更深入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所有可能生锈的部分。因为在去一个真正陌生的地方旅行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去旅行到一些心情和精神状态和隐藏的内心通道，否则我们很少有理由去参观。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当我在泰国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禁酒主义者，通常晚上9点睡觉，但我在当地的酒吧熬夜到黎明；在西藏，虽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我在寺庙里呆了几天，听圣歌。我去冰岛参观我内心的月球空间，在那个广阔而没有树木的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宁静和空虚中，挖掘我自己通常被喋喋不休和日常生活所模糊的部分。

然后，我们去旅行，既寻找自我，又寻找匿名——当然，也在寻找我们所理解的另一个。在国外，我们非常没有种姓、工作和地位；正如黑兹利特所说，我们只是“客厅里的绅士”，人们不能给我们起名字或标签。正是因为我们以这种方式澄清，摆脱了不必要的标签，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自己更重要的部分（这可能开始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离家很远的时候会感到最有活力）。

在国外，我们会熬夜，跟随冲动，发现自己就像恋爱时一样开放。我们的生活没有过去或未来，至少有那么一瞬间，我们自己可以被争取，可以被解释。我们甚至可能变得神秘——起初对别人，有时对我们自己——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

当然，对于各种自由来说，这都有很大的危险，但它的巨大希望是，只要旅行，我们就重生了，能够在某些时刻回到更年轻、更开放的自我身边。在很小程度上，旅行是一种扭转时间的方式，让一天持续一年——或者至少45个小时——旅行是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像在童年时一样，用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语言促进了这种开放，因为当我们去法国时，我们经常迁移到法语，而更孩子气的自我，简单和礼貌，说外语教育。即使我在河内不说洋泾浜英语，我也以积极的方式简化，不关心表达自己，而只是有意义。

因此，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旅行不仅仅是对未知的追求，而是对未知的追求；至少，我旅行是为了寻找一只无辜的眼睛，让我回到一个更天真的自我。我比在国内更相信国外（虽然再次危险，但至少可以帮助我扩展我的视野），我在国外更容易兴奋，甚至更善良。因为我遇到的任何人都不能“安置”我——没有人能让我在我的新泉——我可以更好，当然，更糟（如果旅行是出了名的虚假身份的摇篮，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真实身份的熔炉）。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旅行可以是一种修道：在路上，我们经常生活得更简单（即使住在豪华酒店），没有我们能携带的财产，让自己的机会。

这就是加缪所说的“赋予旅行价值的是恐惧”的意思——换句话说，是把破坏（或解放）从环境中解脱出来，以及我们所隐藏的所有习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旅行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为了寻找更好的问题。我，像许多人一样，倾向于问问题的地方，我喜欢大多数问最搜索的问题：在巴拉圭，例如，一辆车每两个偷了，三分之二的货物走私，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每一个加州的假设。在泰国，许多年轻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放弃自己的身体——成为更好的佛教徒——我不得不质疑自己过于成熟的判断。”“理想的旅行书，”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曾经说过，“也许应该有点像一个犯罪故事，你在寻找一些东西。”这是最好的东西，我要补充一点，如果它是你永远无法找到的话。

事实上，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去东南亚，十多年前，我如何回到我的公寓在纽约，躺在床上，保持时差，回放，在我的记忆中，一遍又一遍，我经历，和寻呼虽然我的照片和阅读和重读我的日记，好像提取一些神秘。任何目睹这一奇怪场景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我恋爱了。

如果每一个真爱可以感觉像一个外国之旅，你不能说语言，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拉更深的黑暗，每一次外国可以恋爱，你留下困惑你是谁，你爱上了谁。有人估计，所有伟大的旅行书籍都是爱情故事——从《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到《神曲》和《新约》——所有美好的旅行，就像爱情一样，都是关于从你自己身上展开，沉浸在恐惧和惊奇之中。

这个比喻也让我们明白，所有的旅行都是双向的交易，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如果战争是国家相遇的一种模式，那么浪漫就是另一种模式。因为当我们出国时，我们经常忽视的是，我们和我们审视的人一样，都是被审查的对象，我们正在被我们消费的文化所吞噬，在路上和我们在家里一样。至少，我们是猜测的对象（甚至是渴望的对象），他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来说就像他们对我们自己一样具有异国情调。

我们是日本家庭电影中的喜剧道具，马里轶事中的怪事，以及中国笑话中的秋天的人；我们是移动的明信片或奇怪的物品，秘鲁的村民后来会告诉他们的朋友。如果旅行是关于现实的相遇，那也是关于幻想的配对：你给我我梦想的西藏景象，我会给你你渴望的加州。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尤其是）那些逃离国外美国的人，都会被随意地被当作美国梦的象征。

事实上，这也许是旅行向我们提出的最核心、最痛苦的问题：如何回应人们对你温柔的梦想？你是否鼓励他们认为牛奶和蜂蜜的地，即使它是你抛弃的同一块土地？或者你是否试图抑制他们对一个只存在于头脑中的地方的热情？毕竟，要加快他们的梦想，可能是为了制造一种幻想；然而，打击他们可能会剥夺他们在逆境中支撑他们的唯一财产。

整个复杂的互动——与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所面临的困境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平衡真实和机智？）--的部分原因是很多伟大的旅行作家，本质上，爱好者：不只是皮埃尔洛蒂，著名，臭名昭著，坠入爱河了他下车（一个原型的水手留下后代的形式蝴蝶夫人神话），还有亨利·米勒，h·劳伦斯或格雷厄姆·格林，他们都有隐藏的真理，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在国外一样容易悲观主义者。他们谁都不知道周围地方的不足，但所有人都选择了去那里，就选择了寻找一些值得欣赏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相信“被感动”是旅行的要点之一，并通过私人和公共方式“被运输”；所有人都看到了“狂喜”（“前停滞”）告诉我们，当我们不静止的时候，我们的最高时刻就到来了，顿悟可以伴随运动，就像它沉淀它一样。我记得有一次问伟大的旅行作家诺曼·刘易斯，他是否有兴趣写关于南非种族隔离的文章。他惊讶地看着我。”要把一件事写好，”他说，“我一定得喜欢它！”

与此同时，由于这一切都是从奥维德到奥洛克旅行的内在特征，旅行本身正在像世界一样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旅行作家的授权。如今，仅仅走到地球的尽头还不够（尤其是因为地球的尽头经常来到你身边）；几年前，像简·莫里斯这样的作家，只要通过航行到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就能取得奇迹般的成就，现在任何拥有签证卡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莫里斯，实际上，是记录帝国的最后几天，一个年轻的旅行作家在一个更好的位置图表新帝国的第一天，国家，全球，移动和勤奋的统治在运输道具和世界各地的价值观。

19世纪中期，英国以将《圣经》、莎士比亚和板球传播遍世界而闻名；现在，一个更国际化的帝国正在派遣麦当娜、《辛普森一家》和布拉德·派特。每种文化在这些常见的参考资料中接受的方式告诉你关于他们的本土产品的信息。毕竟，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麦当娜听起来和儒家国家的圣母完全不同，两者都不能和东14街的麦当娜一样。当你去京都的一家麦当劳门店时，你会发现照烧麦克汉堡和培根土豆派。餐垫提供城市的伟大寺庙的地图，周围的海报广播旧金山的奇迹。——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吃他们的巨无霸，棒球帽向后，和紧501牛仔裤，仍然完全和不可剥夺的日本移动的方式，他们点头，他们喝乌龙茶，永远不会被误认为麦当劳的顾客在里约热内卢，摩洛哥或马那瓜。如今，一种全新的异国情调领域源自于一种文化的色彩，而是另一种文化的产物。

另一个让这一切更加复杂和令人兴奋的因素是人们，他们自己越来越像悉尼、多伦多或香港等城市一样，说话多舌和杂种。在很多方面，我是一个越来越典型的样本，如果只是因为我出生在英国，父母是印第安人的儿子，7岁时搬到美国，不能真正称自己为印第安人、美国人或英国人。简而言之，我出生时就像是在旅行，对我来说，即使去糖果店也是一次穿越外国世界的旅行，我看到的一个人都不符合我父母或我自己的遗产。虽然有些是自愿的和悲剧——世界上难民的数量，1970年只有250万，现在至少2740万——它涉及，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跨国的机会在快乐的意义上，能够适应任何地方，习惯局外人，被迫时尚自己的严格的家。（如果我们无处可在，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各地成为乐观主义者。）

此外，即使是那些不在世界各地移动的人，也会发现世界在他们周围越来越多移动。在皇后区或伯克利，只走六个街区，你就可以在几分钟内穿越几种文化；在白宫外面坐一辆出租车，你经常在亚的斯亚贝巴。技术也加剧了这种（有时是欺骗性的）可用性感，因此许多人觉得他们可以不离开房间就能周游世界——通过网络空间或cd-rom、视频和虚拟旅行。有很多挑战，当然，在它说的家庭和社区和忠诚，和担心空调，纯粹的合成版本的地方可能取代真正的东西——更不用说世界似乎越来越流动，移动目标比我们的概念。但，至少对旅行者来说，有一种感觉是，了解家庭和了解一个外国世界可以是一回事。

我们所有人从生以来就感受到这种感觉，并且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采取的所有重大运动都是内在的。我们去旅行，看电影，建立新的友谊，熬夜。小说通常是旅行，就像旅行书籍是小说一样；虽然这至少是关于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在14世纪对他从未去过的远东地区的丰富多彩的描述，但现在这是一个更加模糊的区别，因为体裁的区别与其他边界一起崩溃。

在玛丽·莫里斯的《软禁》中，关于卡斯特罗的古巴，小说家在版权页上重申，“所有的对话都是虚构出来的。”伊莎贝拉，她的家人，居民，甚至拉岛本身都是作者想象的创造。”然而，在第172页，我们读到，“拉伊斯拉，当然，确实存在。”别让任何人为此而愚弄你。只是感觉好像没有。但它确实。”难怪旅行作家的叙述者，一个虚构的结构（或不是）？--承认，她把她的旅游杂志专栏献给了那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毕竟，塞缪尔·巴特勒伟大的旅行小说中未被发现的土地，只是“没有地方”重新安排。

因此，旅行就是一次进入那个著名的主观区域的旅程，想象和旅行者带回来的是——必须是——他自己和那个地方的结合，真正有什么，只有他什么。因此，布鲁斯·查特温的书似乎是围绕着事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展开的。V.S.奈保尔最近的书《世界上的一种方式》作为一个非虚构的“系列”在英国出版，作为一个“小说”在美国出版。当保罗·塞洛克斯半是虚构的回忆录《我的其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在《纽约客》上发表时，它们被狡猾地归类为“事实与虚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旅行是关于感知和想象的阴谋，对我来说，这两位伟大的旅行作家，我经常回来的是爱默生和梭罗（他们曾建议“旅行是傻瓜的天堂”，另一个是“在康科德多次旅行”）。他们都坚持认为，现实是我们的创造，我们创造了我们看到的地方，就像我们读的书一样多。我们在我们自己外面找到的东西必须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它。或者，正如托马斯·布朗爵士巧妙地所说，“我们的内心携带着我们所寻求的奇迹。”我们身上有非洲和她的天才。”

所以，如果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必须承载着自己的内心，我们——爱默生和梭罗提醒我们——也必须带着我们的目的地感。我们探索的最有价值的太平洋永远是我们内心广阔的空间，最重要的西北穿越我们穿越的门槛。在京都找到一个镀金的亭子的好处是，它可以让你把一个更持久的、更私人的金色寺庙带回你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室。

即使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疲惫，我们的旅行不，和一些最好的旅行书籍近年来进行平行旅程，匹配的朝圣的物理步骤与形而上学的步骤质疑（如彼得·马蒂森的伟大的“雪豹”），或记录旅行最远的人类陌生（如奥利弗·萨克的“色盲岛”，它的特点不仅是去太平洋一个遥远的环礁，而且去一个人们对光的看法不同的领域）。我们经常被提醒，最遥远的海岸，躺在我们身边睡着的人身边。

所以，从本质上讲，旅行只是一种保持我们思维活跃和清醒的快速方法。正如我和爱默生和梭罗的继承人桑塔亚娜所写的那样：“尽可能多地从熟悉转向陌生是有智慧的；它保持头脑敏捷；它杀死了偏见，助长了幽默。”浪漫主义的诗人开创了一个旅行的时代，因为他们是睁开眼睛的伟大使徒。佛教僧侣通常是流浪汉，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清醒。如果旅行就像爱，那么最终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高度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是专注的，接受的，不被熟悉所迷惑，并准备被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旅行，就像最好的爱情旅行一样，永远不会真正结束。